

文学及语言

“作品理论” / “文本理论” 与 当代文论的话语革命

周启超

【提要】“作品理论” / “文本理论”，可谓文学理论中基础性与前沿性兼备的轴心理论。以埃科、巴赫金、洛特曼、克里斯特瓦、巴尔特、伊瑟尔、热奈特等名家的文学作品观/文学文本观为基石的当代欧陆文论与斯拉夫文论中的“作品理论” / “文本理论”形态，十分丰富，堪称铭刻着当代文学理论发育轨迹的一种“年轮”。“作品理论”与“文本理论”的嬗变，直接参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革命。以跨文化的视界，对当代国外丰富多彩的“作品理论” / “文本理论”加以多方位有深度地清理，也许是有效深化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路径。

【关键词】当代外国文论 作品理论 文本理论 话语革命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 (2015) 04—0088—05

作品，一如作者与读者，可谓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这一话语实践链上的一个轴心环节。

“作品理论” / “文本理论”，可谓当代文学理论中一个基础性与前沿性兼备的轴心理论。

当代欧陆文论与斯拉夫文论中的“作品理论” / “文本理论”，由翁贝尔托·埃科、米哈伊尔·巴赫金、尤里·洛特曼、茱莉娅·克里斯特瓦、罗兰·巴尔特、沃尔夫冈·伊瑟尔、热拉尔·热奈特等名家的文学作品观/文学文本观所构成。其理论形态十分丰富，堪称铭刻着当代文学理论发育轨迹的一种“年轮”；这些“作品理论” / “文本理论”的嬗变，在直接参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革命。

以跨文化的视界，对当代国外丰富多彩的“作品理论” / “文本理论”加以多方位而有深

度地清理，也许是有效深化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路径。

当代欧陆文论与斯拉夫文论中，“文学作品” / “文本理论”形态是十分丰厚的。在“作品”与“文本”的关系上，有认为“作品”大于“文本”的：譬如，“开放的作品”（埃科），“内外互动的文本”（洛特曼），“具有召唤结构的文本”（伊瑟尔）；也有主张“文本”大于“作品”的，譬如，“作为人文学科第一性实体的文本”（巴赫金），“具有生产性的文本”（克里斯特瓦），“作为一种能指星系的文本”（巴尔特）。

文学文本可以被喻为“乐谱”，文学作品则被喻为“合唱”。

文学作品可以被喻为“核桃”，文学文本则被喻为“洋葱”。

文学文本可以被看成是古代羊皮纸般层层叠印的“隐迹稿本”，文学作品则被看成马铃薯般无处不可抽芽的“块茎”。

在国外文论界，如今已很少有人将“作品”等同于“文本”。在我国学界，却仍有一些学者认定“作品”与“文本”是一码事，仍有一些专家认定在“作品”与“文本”上做文章不过是在玩文字游戏。

“文学作品” / “文学文本”理论的发育与变异过程，堪称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一种“活化石”般的学术标记。“作品理论”与“文本理论”的嬗变，直接参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革命。毕竟，从“作品论”转向“文本论”，抑或从“作品论”走向“文本论”，显现出文学观念的流变轨迹，意味着文学学领域“牛顿视界”与“爱因斯坦视界”的思维范式转型。或者说，复数的“文学作品/文本理论”，堪称丰富的文学理论生命信息积淀于其中的“大分子”。着力于这种“大分子水平”上的理论资源之多方位的清理而又有深度的开采，当有可能推进文学理论这一人文学科的建设，当有可能深化当代文学理论这一门经受种种挑战然而并未消亡的学问。

应该看到，“文学作品理论”与“文学文本理论”是20世纪外国文论最为突出的建树之一。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文论界大多谈论的是“文学作品理论”，那么，20世纪后半期，“文学文本理论”更受青睐。20世纪前半期，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追问“是什么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英美新批评倾心于“自足的、有机的”文学作品，波兰现象学美学家罗曼·英加登潜心于文学作品的层次构成，瑞士文论家沃尔夫冈·凯塞尔探究“作为语言艺术的作品”。20世纪前半期的这些学派与大家总体上都是在探讨文学作品的生成方式、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都是在建构“文学作品理论”，尚不是“文学文本理论”。20世纪后半叶，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文论、苏联塔耳图——莫斯科结构——符号学派文论、德国康斯坦茨接受美学学派文论、美国解构主义文论尤其“耶鲁学派”文论，总体上都是推重“文学文本”，在“文本理论”上多有创获。“作品”概念之淡出，“文本”概念

之凸显，确实标志着当代文学观念的重大变迁。从“作品等同于文本”、“作品大于文本”、“作品小于文本”这些不同视界的变换，便可以看出“文学作品理论” / “文本理论”追求自立——获得自主——向外扩展，由“小写的文本”变成“大写的文本”的流变轨迹，便可以看出文学理论的兴奋点由“作者世界”转向并沉入“作品世界/文本世界”的年轮或足迹。

罗兰·巴特的名篇《从作品到文本》，正是当代文学观念上这一变迁之重要标记，正是当代文学理论兴奋点的这一漂移之典型体现。

“作品”概念之淡出，“文本”概念之凸显，乃是一个时代文学观念变迁的表征。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既要看到：“作品”概念之淡出，“文本”概念之凸显，这确是一个时代——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转型时代文学观念变迁的表征，也要注意不要掉入“思潮更替论”的陷阱，不要对巴尔特跟进得太紧而追随他走得太远：真的以为从今往后便是“从作品走向文本”，“作品理论”已经落伍，取而代之的是“文本理论”，似乎现如今再谈“作品”就是保守朽旧，侈谈“文本”才是时尚新进。

20世纪外国文论在“文学文本” / “作品理论”上的建树之复杂丰繁，更呼唤着我们超越“主义”较量与“思潮更替”的思维定式，而去展开细致的清理与缜密的辨析。拘泥于直线型的历史“进化思路”，袭用文艺思潮甚或文艺主潮的“更替模式”来观照“文学文本” / “作品理论”的流变，很有可能会遮蔽一些东西。有学者已经敏锐地看出，“作品论”强调文学的形式、风格和审美特性，代表了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取向；“文本论”则强调开放性、超越性和相对性，将它带入了具体的语言活动之中，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另一种取向。“作品论”以单数、封闭的物质性对象为根据，确信普遍意义的存在，并指向和追索所指；“文本论”则强调其互文状态的网状结构，以能指游戏为指向，消解了权威、中心和普遍意义。“作品论”以形式主义为代表，“文本论”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南京大学周宪教授多年潜心“文学理论基本问题：从现代到后现代”研究，

在对后结构主义的“文本观”与形式主义的“作品观”之分野加以辨析时指出，

从作品论到文本论反映了特定时代文学理论范式的深刻变革。

作品论和文本论分别代表了文学理论的现代与后现代范式。^①

这种概括堪称精炼而颇有见地。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形是相当复杂的，恐怕还不是“由作品论走向文本论”这样一句断言就可以“一言以蔽之”。

其实，历史进程表明：有由“作品论”走向“文本论”的情形，也有由“文本论”走向“作品论”的情形。

“塔尔图学派”与“康斯坦茨学派”固然都重视文学文本的结构研究，但在总体上都不曾放弃“作品论”。伊瑟尔在接受理论推重“文本的召唤结构”，但也强调文学作品是“艺术极”与“审美极”之合成。况且，塔尔图学派与康斯坦茨学派这样的“文学作品”/“文本理论建构”，也都是发生于那个时兴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年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看来，不宜构建一律“走向文本论”的神话。

更不宜一谈“文本理论”，就没有“作品理论”的位置了。

那种以为凡坚守“作品论”者，就一定是信奉古典；凡推崇后现代者，必然是高扬“文本论”，似乎有些绝对化有些简单化的偏颇。

看来，大谈由“作品”向“文本”的转向或由“作品论”向“文本论”的转型，并由此扩展提升，把这一转型看成是“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之“大转向”的一种表征，这一思路似乎是值得商榷的。

应该看到，一如“作品理论”有多种形态：有英加登的“作品理论”，也有凯塞尔的“作品理论”，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作品理论”，也有英美新批评的“作品理论”。“文本理论”也绝非是铁板一块。在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中，有埃科的“文本理论”，也

有洛特曼的“文本理论”，有克里斯特瓦的“文本理论”，也有巴尔特的“文本理论”，更有热奈特的“文本理论”。对多姿多彩的“文本理论”，我们不应当想当然地予以简化。譬如，不应当将后结构主义的“文本理论”简化为解构主义的“文本理论”。

深入地清理20世纪文学“文本理论”的实绩，还需要将一些哲学家、美学家、语言学家的“艺术作品理论”或“文学文本理论”甚或“话语理论”也纳入视域。譬如，索绪尔、卡西尔、克罗齐、海德格尔、杜夫海纳、雅各布森、叶姆斯列夫、本韦尼斯特、梵·迪克、迦达默尔、利科、吉尔·德略兹与菲利克斯·瓜塔里等人的相关学说。

一方面，这些哲学家、美学家、语言学家对当代文学作品/文本理论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的学说有助于我们廓清不同界面的“文本”理论：有后现代主义诸种流派学说中的“文本”理论，也有作为语文学概念的“文本”理论，还有作为符号学和文化学概念的“文本”理论。

我们要看到：这些不同立场不同姿态的哲学家、美学家、语言学家在“文本理论”上有差异也有相通，有“不约而同”，有“异曲同工”。巴赫金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撰写的《语言学、语文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中的文本问题：哲学分析之尝试》一文中，就已经将文本看作是“任何人文科学的第一性实体（现实）和出发点”。他认为，“如果在文本之外，脱离文本来研究人，那这已不是人文学科。”巴赫金将文本界定为具有“主体、作者”的话语，他所关注的对象是“真正创造性的文本”，是“个人自由的领悟”：文本的涵义“就在于关系到真理，真、善、美，历史的东西”。巴赫金强调，忠实于自身特性的文本体现着“对话的关系”：既对此前的话语作出应答，也诉诸他人具有主动精神的创造性应答。可见，巴赫金的“文本”

① 周宪：《论作品与（超）文本》，《理论创新时代：中国当代文论改革与审美文化转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宁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9~60页。

已然是文化学——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界面上的“大文本”，巴赫金的这种“大文本”理论与德里达的“大文本”理论是不是自有不同的旨趣，也有相通之处？巴赫金的文本思想，^①与德里达的文本思想，对于“文学文本理论”研究的意义，可谓异曲同工。

其实，将世界文本化，将生活文本化，也并不是德里达的发明。《圣经》中的摩西就已把世界称为上帝之书。“书”作为存在之象征，在文艺作品中早就有所反映，不仅有直接的反映，也有间接的反映、“潜台词”似的反映。譬如，19世纪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名篇《预言者》的主人公“从人们的眼睛里”读出了“罪与恶的文辞”。不过，诚如俄罗斯学者瓦·哈利泽夫所言，对世界图景加以“无限文本化”的“无边文本理论”，这在哲学本体论中有一定道理，在个别具体的学科中就未必有效。^②

看来，“文学文本理论”研究要大力开拓视野，也要努力聚焦本位。

这样，我们才能比较充分地展示形态多样的“文学作品/文本理论”，比较清晰地呈现“作品等同于文本”、“作品大于文本”、“作品小于文本”之不同景观与成因，比较到位地阐释“文学作品理论”/“文本理论”追求自立——获得自主——向外扩展，由“小写的文本”变成“大写的文本”的流变轨迹，进而，由此来显示当代文学理论由“作者世界”转向并沉入“作品世界/文本世界”的年轮或足迹。

毕竟，“文学作品理论”/“文学文本理论”的发育与变异过程，是铭刻着当代文学理论演变轨迹的一种“年轮”。

毕竟，“作品理论”与“文本理论”的嬗变，在直接参与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革命。

由此，我们需要了解国外文论大家在“文学文本”/“作品理论”上的具体建树。

尤其是需要重点检阅那些已经在文学观念的演变与文学疆域的拓展进程之中，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之中，已然发生深刻影响的当代国外文论大家的“文学文本观”/“文学作品观”。

这种了解与检阅，不应当满足于听别人讲

故事，也应当自己去看风景。

不应当仅仅停留于种种“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教程”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读”中所常见的述评；不应当仅仅驻足于批评史家对一些理论学说之片言只语式的征引、若明若暗的转述，而应当直接进入这些理论文本。

最为理想的路径自然是直接阅读这些理论文本的原文。

退而求其次，也应是阅读这些理论文本的直译本。转译本毕竟已经与原文隔了两层，很可能是“影子”的“影子”了。

由此，我们需要一部既拥有跨文化大视界而又聚焦于当代国外文论大家“论作品/文本”之基本文献的读本——《当代国外文学文本/作品理论读本》。^③

看来，我们这些坚守在外国文学理论研究园地上的耕耘者，要肩负起为国人继续“拿来”——继续译介国外文论的优秀成果——这一重任。要积极传承并发扬钱锺书、冯至、叶水夫、陈槃等前辈学者在改革开放初期编选翻译《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的治学精神与建设热忱，继续精选精译当代国外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文本”/“作品理论”资料，积极吸纳当代国外“文学文本”/“作品理论”的重要思想成果。

“作品理论”/“文本理论”，一如“作者理论”、“读者理论”，乃是文学理论中的基础性与前沿性兼备的轴心理论。当代国外“文学作品”/“文本理论”更是20世纪外国文论最为突出最为丰硕的果实。

——如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英美新批评学派、

① 参见拙文：《试论巴赫金的“文本理论”》，《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

② 参见瓦·哈利泽夫著：《文学学导论》，周启超、王加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306页。

③ 这一“读本”工程，拟由《当代欧陆文论大家文学文本/作品理论读本》、《当代斯拉夫文论大家文学文本/作品理论读本》与《当代美英文论大家文学文本/作品理论读本》等构成，这是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一项基础性与前沿性兼备的重大课题；作为这一工程的前奏，本文作者已编选出《当代国外文学文本/作品理论文选（歌德与斯拉夫大家名篇（1958~2008）》。

英加登、凯塞尔在20世纪前半叶不约而同地倾心于“文学作品理论”构建，巴赫金、梵·迪克、克里斯特瓦、伊格尔顿在20世纪后半叶不约而同地关注“文本理论”，甚至提出“文本科学”。

以跨文化的视界，对当代国外丰富多彩的“作品理论”/“文本理论”加以系统的多方面的开采、整理与研究、介绍，是一项能有效深化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基础研究，是比较诗学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由比较诗学来建构理论诗学的一个基本路径。

一个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想必总要面对：

何谓“作品”？何谓“文本”？

一个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文学理论家）想必总要叩问：

究竟是什么使得一部文本成为“文学文本”？抑或一部“文学作品”究竟是如何生成的？

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想必总会追问：

究竟是什么使得一部“文学文本”具有想象性、意向性、动情性、审美性、自在性、虚在性、超验性、开放性、召唤性、互文性、生

产性、建构性……？

在刚刚过去的五十年里，当代欧陆文论界与斯拉夫文论界最有影响的七位大家——翁贝托·埃科、米哈伊尔·巴赫金、尤里·洛特曼、茱莉娅·克里斯特瓦、罗兰·巴尔特、沃尔夫冈·伊瑟尔、热拉尔·热奈特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已经对这些既是基础的又是前沿的文学理论命题、课题、问题做出各有千秋的探索。

且让我们通过对这些国外文论大家的“作品观”/“文本观”比较系统地了解，来展开我们自己在这些既是基础的又是前沿的文学理论轴心问题上的积极思索。

且让我们经由与当代欧陆文论与斯拉夫文论这些重要学说比较到位的对话，来深化我们自己在这些既是基础的又是前沿的文学理论核心课题上的不懈探索。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马光

“Theory of Works” / “Theory of Text” and Discursive Revolution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Zhou Qichao

Abstract: “Theory of works” / “theory of text” is the axis theory, both fundamental and frontier in literary theory. Among the European Continental and Slavic literary theories, such great theorists as Eco, Bakhtin, Lotman, Kristeva, Barthe, Iser and Genette present “theory of works” / “theory of text” founded upon the concepts of literary works / literary text and their “theory of works” / “theory of text” is colorfully diversified whose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y are impressive. The change from “theory of works” to “theory of text” can directly take part in the discursive r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Under the cross-cultural horizon, the sorting out of “theory of works” / “theory of text” in width and depth may be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construction.

Keywords: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ry theory; theory of works; theory of text; discursive revolution